

主编：

李复兴 张桂年

黄树红 萧海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ZHUANTISHI

现代中国文学专题史

浙江大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文学专题史

(上册)

主 编 李复兴 张柱年
黄树红 董 海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

宁波甬江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625 字数306千

印数1—12,55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8-00230-6

I·618 上下册定价: 8.80元



前 言

为适应教学需要，与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评》配套，由广东、江西、浙江、山东、辽宁等省十余所高校的现代文学教师协作编写了《现代中国文学专题史》。全书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大部分。每部分除概述外，重点评述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的某些特点或贡献。

为本书的出版，山东曲阜师大魏绍馨教授特地赶写了“导论”，杭州大学郑哲魁教授应邀撰写了“鲁迅”专题，浙江教育学院蒋成珏副教授审订了“散文”和“诗歌”。对他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主编采用分工负责制。萧海、黄树红负责小说，张桂年负责散文，李复兴负责诗歌，萧海负责戏剧。全书由萧海统稿。

参加编写的同志有（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官鹏、王旭升、马殿超、卢玲、卢文、冯健中、孙宗良、刘怀玺、刘明、李复兴、李晓虹、李标晶、李彪、许征社、任月明、陆文采、初玉宙、陈正平、郑志杰、郑志文、林望锦、周济成、周文、罗淦先、罗宗义、范文发、赵朕、张桂年、张芳英、张志勋、徐越化、顾琅川、夏崇懿、袁靖新、黄树红、黄文强、黄伙育。

黄旅德、常祖淑、谢本良、谢淑玲、傅绍德、萧海、彭守庆、
翟大炳、谭庆禄、薛伟。

由于分散编写，难尽统一，又加时间匆促，错误与缺点
定然很多，敬请批评指正。

1989.2.26

目 录

(上册)

导 论

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潮	(1)
-----------	-------

小 说

1. 概述	(39)
2. 鲁迅	(68)
3. 文学研究会	(98)
4. 创造社	(120)
5. 乡土文学	(137)
6. 茅盾	(151)
7. 巴金	(169)
8. 老舍	(188)
9. 革命派小说	(211)
10. 丁玲	(235)
11. 张天翼、沙汀、艾芜	(247)
12. 沈从文	(268)
13. 李劫人	(277)
14. 张恨水	(294)
15. 新感觉派	(310)
16. 东北作家群	(322)

17. 赵树理、孙犁..... (339)
18. 周立波及解放区其他小说家..... (364)
19. 路翎..... (384)
20. 钱钟书、黄谷柳..... (395)
21. 台湾香港小说..... (413)

导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潮

几十年以前，茅盾在批评王哲甫的学术专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时候就指出：“近代文学的各种主义都在我们文坛上起过或大或小的泡沫，然而又不是此兴彼仆的递代，而是同时交流，成为一大旋涡。”这就给人们学习、研究和编著中国新文学史提出了一个任务：首先要认真去解剖“文坛的潮流”，而不能只是罗列文学运动的史料、文学作家的评传和文学作品的分析。这些材料当然是需要的，没有具体的文学运动的史料、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论，文学史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可是只有把这些材料“和文坛潮流联系起来”，即放在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去认识，才能“把五四以来的文坛现象叙述得很清楚”。这个意见直到今天对于我们仍然是很有启发的，它告诉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决不能离开或忘记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考察。其实何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应该如此呢！目前已出现的研究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著述很多，然而最有影响的却是丹麦学或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就是因为它把欧洲十九世纪文学中的许多现象、包括文学运动的史料及作家作品，都放在当时的社会及文学思潮的变迁发展中去认识，使读者透过这些文学现象看到了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抗日战争时期，李何林撰写过一部颇有价值的书——《近二十年中国文学思潮论》，它第一次将五四以后的中国文艺思潮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过也正如作者后来所说的，它“只能叫做文艺思想斗争史料长编”。由于该书突出了“文艺思想斗争”，并未能概括出这二十年的中国文艺思潮及其各种流派之间纵横交错的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完全没有涉及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家与文学作品，这就不可能反映“文学思潮”的全貌，更不必说“史”的发展了。抗战胜利之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我们国家有多部《现代文学史》或《新文学史》出现，但多数是文学思想斗争加作家作品评论。再到“十年文革”期间，“思想斗争”就代替了一切。近十年来，学术界不仅对众多的现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重新的研究与评价，而且也开始了现代文学思潮史、小说史，诗歌史、散文史、话剧史的研究，使现代文学史的内容日益丰富起来。

所谓“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重要的、先行的部分。它往往是从某种文学思想的倡导和文学作品的表现开始，逐渐成为一种思想的潮流。过去我们总是比较重视文学与政治、经济的直接联系，在现实生活中要求文学及时地、直接地反映政治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变动；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也一定要为每一种文学现象的存在找到一种具体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其实和文学联系更为直接的是社会思潮。一般来说，文学与文学家是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部分，一种社会思潮往往首先在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中率先反映出来，即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学思潮。鲁迅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

定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既有其历史的和社会内部的原因，也是由于外来思想与文学的冲击与影响。许多文学家在向外国学习或向本国介绍外国文学时，不仅注意于某些具体的作家作品，而且重视其文学思潮。也可以说首先是为某些文学的和社会的思想潮流所吸引。比如鲁迅，在开始文学创作的十年以前，就注意并向国内介绍西方现代派的思潮与“摩罗”派的文潮，首先呼唤他们那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出现。茅盾也是在发表小说之前就先后注目于西方的“新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郭沫若则是西方的泛神论、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等社会及文艺思潮的最早的接受者与表现者。许多事实证明，在大动荡、大变革的现代社会中，不能把握整个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趋向的人，是不可能文学运动与文学创作中做出什么重大成就与贡献的。离开时代大潮的作家，即使有出众的才华，也将会为历史所淘汰，如周作人、张资平及鸳鸯蝴蝶的许多作家就是。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时代只能有一种流派，恰恰相反，不同的文学流派共存于现代社会的文学与思想大潮中，在自由创造、自由竞赛中发展，由人民与历史去作出最后的选择。强行扬此抑彼，甚至依靠某种外力去压制某种文学流派，是不利于文学本身的发展的。

（一）十九世纪末与廿世纪初的文学改革

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习惯的说法是指“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学。它从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到思维方法、表现方法，都和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截然不同，而和外国、特别是西方近、现代文学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可是近几

年对此问题又有许多新的意见很值得重视。比如有人以“廿世纪的中国文学”的提法来概括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发展(把人们习惯说的“近代文学”的最后部分也包括在其中)，就不无道理。本教材仍沿用习惯的说法，以“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上限。不过若从“史”的角度看就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文学上的“五四”决非从天而降，它无疑是清末文学改革思潮与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与发展。

十九世纪末与廿世纪初，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转折时期，中国这个古老的黄土地上也出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输入西方民主主义新思想，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西文化的大论战。当时的新派人物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在介绍与传播进化论、天赋人权说等新思想和批判儒家旧礼教的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确都是一些思想敏锐的“先觉善斗之士”，深刻地意识到落后贫穷的中国若不彻底打破闭关自守的状态，大量吸收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实行有效的社会改革，很快就会为突飞猛进的世界发展新潮流所淘汰。而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为号召的文学改革思潮运动就是这次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清代文坛上，居于正统地位的一直是所谓桐城古文、选学骈文和宋诗派的诗(小说戏曲虽有发展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却不能进入文学的殿堂)。进入清末以后，它们都成了如梁启超所说的“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的有形无神的拟古主义诗文流派。这些流派的诗人与作家们固守传统的诗文理论，脱离现实生活，拒绝一切新的思想、新的事物、新的语言与新的表现方法，诚如黄遵宪讽刺他们的那

样：“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诗人如此，文人也不例外，“亦有高材生，各自矜爪嘴；祖汉夸考据、媚守争义理；彼此互是非，是非均一鄙。”总之，旧派诗文已毫无艺术的创造力，成为中国文学与整个文化思想发展的严重桎梏。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所发动的“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就是作为它们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以“崇白话、废文言”为口号，力倡言、文合一的“文界革命”，不仅是一种文体的解放、文学的语言形式的改革，而且是要使中国的散文从达官贵人的楼台阁榭中走出来，“通用于今，通行于俗”，与现实生活取得应有的联系，“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通文字之用”。正是在“文界革命”的号召下，产生了清末民初的众多的白话报，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它“多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次的“文界革命”无疑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革命派的诗人黄遵宪早就提出过“我手写吾口”的口号，在反对拟古主义中强调诗歌创作中的个性化口语化。当然并不是“我手”所写的“吾口”都可以成为好诗，所以还必然作到“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即必须真正反映社会生活，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他当时写的许多反帝爱国主义的诗篇都是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梁启超、谭嗣同、夏穗卿等人亦有志于“新体诗”的创作，但他们早期的作品多数只是以新名词入诗以表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总结了他们的得失，充分肯定了黄遵宪的道路，强调诗界革命最重要的

“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要写新体诗就必须“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麦哲伦）然后可”。即要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首先是新意境的创造。留学日本的鲁迅，虽然并没有参加梁启超等人的“诗界革命”，但他对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及其“刚健不挠”、充满着“伟美之声”的诗歌创作的介绍与评论，客观上也为当时的“诗界革命”作出了新的贡献，也是“诗界革命”思潮的一部分。

“小说界革命”比“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具有更大的声势与影响。它首先冲破了鄙视小说及小说家的传统旧观念，重新认识小说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探讨小说的美学意义。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与美学思想，借鉴西方与日本人对于小说与戏剧的重视，梁启超等强调小说与人生的密切关系、小说在改造社会人生中的重大作用。因而极力提高小说与戏剧的社会地位，从各个方面论证“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戏园为天下之大学堂”。由此出发，自然而然地也就提高了小说与戏剧的作者以及历来被称之“优伶”的戏剧演员的社会地位。在此同时，西方近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悲剧观念、美学思想，初步被介绍于国内的读者，外国的小说与戏剧作品，也开始翻译成汉文，使中国读者的视野大开，知道西方还有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林琴南这位桐城古文派的末代弟子，也为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作出了重大贡献。

小说界革命是从批判旧的小说观念与小说创作开始的，但是倡导“小说界革命”的人并没有全部否定旧小说，有人还主张必须继承与借鉴中国旧小说的长处与优点。如何认识与评价旧小说，如何看待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也成为“小说界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欲振兴吾国小说，不可

不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在这个初步研究中,《水浒传》、《红楼梦》等优秀古典小说受到充分肯定,中国小说与戏曲发展的轨迹也开始为人们所认识。

“小说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新民”与“新中国”而创作“新小说”。在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下,倡导者们对新小说的创作态度、创作方法等,也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关于小说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其中影响较大者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月报》等;创作与翻译小说汗牛充栋,多至数千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被鲁迅称之为四大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以及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当时的文学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一样,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更没有促成新文学的诞生。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的软弱性与中国封建旧文化、旧势力的顽固性,使当时的思想启蒙与文学改革运动未能象欧洲的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运动那样产生众多的“巨人”。严复、梁启超、林琴南等人,从事的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化与文学事业,可是他们本身又有较为浓厚的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意识,因而很快就由前进的战士变为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加上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任务,不仅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而且还有十分严峻的救国反侵略的政治斗争。思想上的个性解放、文学本身的民主改革,常常要让位于、服从于民族救亡图存的政治呼唤。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政治历史的舞台以后,便集中主要精力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政治与军事斗争,而未能将文化思想上的

启蒙与文学领域的改革运动引向深入。因而使献身于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和由精神上“立人”、“兴国”的鲁迅陷入了深沉的悲哀，只好在寂寞中期待着“第二次维新之声，亦将再举”与“中国文事复兴之有日”。虽然他不知道这个日子何时才能到来。

（二）文学革命与五四文学的主潮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名为民主共和实为更加黑暗的封建专制。这时代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与梁启超一代人不同，多数是留学日本与欧美的学生，已在民主主义和科学思想的教育下形成了新的世界观、新的思维方式。民国初年的黑暗现实，一方面加重了他们的精神痛苦，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他们的反抗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促使他们认真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团结一部分先进知识者，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动了新的文化革命与文学革命运动。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与《文学革命论》。前者以明确的“八事”

（后来他又归结为“八不主义”）提出了改良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必须解决的许多问题，其中心是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为指导，用通俗易懂、新鲜活泼的白话文代替那早已僵化的文言文作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后者公开打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揭露与批判了以桐城派古文、选学派骈文与江西诗派为代表的陈腐旧文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国民文学、写实主义与社会文学的任务。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中的“问题”与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义”相结合，惊心动魄、震聋发聩，立即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的积极响应，形成了一个

批判旧文学、痛斥“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主张改用白话与新式标点、讨论各体文学如何改革的热潮。

早在1915到1916年，胡适就在美国与其同学讨论过文学革命和如何“为大中华创建新文学”的问题。当时他们是就文学论文学的。《新青年》所发动的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是整个文化思想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陈独秀在其《文学革命论》中指出的：辛亥革命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致使“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因此要改革中国社会便不能不改革文化思想、改革旧文学。这一点恰恰和鲁迅十多年前的想法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正是他早已盼望的“第二次维新之声”。于是他才从沉默中奋起，积极投身于反对封建旧文化旧思想的斗争，“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作与发表了一系列小说、杂文与白话新诗，具体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文学革命的发动，批判旧文学的热潮，一方面推动更多的进步青年投入反封建的斗争，推动了《新潮》、《新社会》等进步报刊的诞生；另一方面也激起了旧派文人的不满与反抗，促使了《国故》一类的怪胎的形成。曾经在翻译西方小说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新派人物林纾，进入五四以后竟以封建遗老自居，顽固地维护桐城古文的正统，先后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以及极力反对革新派“覆孔孟、铲伦常”的《致蔡鹤卿太史书》，直至以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对革新派人物进行人身攻击。一场新旧文学、新旧思想的激战，合乎规律地出现了。但是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也和整体上的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一样，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

鲁迅当时就指出：“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可知五四文学革命与整个新文化运动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新思潮影响与推动下出现的。因此它首先是一次空前的思想感情的解放运动，“人”的解放运动。过去的中国人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与等级观念的桎梏下生活，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一级一级制驭着，没有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价值。这个运动首先把人的头脑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人们开始有了“人”的意识、“人”的觉悟，知道享受“人”的权利，敢于自由地去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表达“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正是在这一思想启发与指导下，周作人发表了《思想革命》、《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将文学革命引向深入，即从以白话文运动为主的初期引向以思想内容的大改革为主的第二阶段。所谓“人的文学”，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所谓“平民的文学”，就是以平民的思想观念，普遍的文体，描写平民生活的文学。

1917年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直接影响到整个欧洲，结束了持续数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中国爆发了震动世界的五四运动，这是一次空前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既由先行的文化革命与文学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的准备，反过来又推动文学与文化革命向纵深发展，给它增添了新的精神力量，指出了新的前进方向与道路。从另一方面看，通过五四运动的冲击，也大大挫伤了新文学及新文化反对者的气势，连林琴南也只好偃旗息鼓，承认自己无力与新潮流抗衡。

正如鲁迅后来所说的那样，五四文学革命“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就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前就撰写过《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向国内读者介绍欧洲文艺发展史中的几个阶段与各种“主义”。《文学革命论》的结尾更是振臂高呼，希望有中国的雨果、左拉、歌德、霍普特曼、狄更斯与王尔德产生。鲁迅是在尼采思想与“摩罗精神”影响下走上文坛的，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就已经读过“百来篇外国作品”。尼采的个性主义在他的《狂人日记》与许多随感录中都是极为重要的精神支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在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启发下写成的，他还明确地提出新文学的表现方法应该以西洋文学为模范，应该多从西洋名著中“取例”。文学革命发动之初，《新青年》及其他新文化报刊广泛介绍了西方近现代各个国家与民族（包括俄国与东欧）、各种思潮与流派的文学。适应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于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显示出大家普遍注意的中心。特别是易卜生的“写实主义”与“个人主义”引起了许多文艺工作者与青年知识者的共鸣，顿时在中国文坛与思想界出现了“易卜生热”。从胡适的《终身大事》开始，“问题小说”、“问题剧”相继出现，娜拉式的女性、斯铎曼医生式的“国民公敌”纷纷登场。易卜生的名言“世界上最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成为鼓舞无数青年革新家的精神力量。

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文坛的主要影响是吸引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去研究与学习俄罗斯文学。他们当中，有人认为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是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思想；有人认为俄罗斯文学是近代世界文学的